



大黄鱼资源“枯竭”之谜(上)

□何良京

笔者曾在晚报发过一篇《大黄鱼记忆》的文章,提到野生大黄鱼资源“枯竭”的其中一个原因,可能是遭到“敲罟”捕捞所致。对此,有读者表示认同,但也有读者表示质疑,同时提出了带有“揭秘性”的“真实原因”。这其中,较有代表性也具有一定权威性的,当属宁波市渔文化协会常务副会长何其茂先生的说法。

用何会长的话说,在当年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,野生大黄鱼资源的“枯竭”可以说是一种必然。但这个必然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偶然因素,是某次特定事件,把野生大黄鱼几乎“一网打尽”,从此形不成渔汛,以致大黄鱼的产量呈“断崖”式跌落。

何会长说,野生大黄鱼资源我们这边曾经是非常丰富的,每年渔汛期都多到消化不了。以当年宁波海洋渔业公司捕捞量为例,东海四大海产品(大黄鱼、小黄鱼、乌贼、带鱼)占该公司全年捕捞总量75%以上,而四大海产品总量中大黄鱼差不多占了一半。然而尽管如此,大黄鱼还是没能逃脱几乎被“灭绝”的命运,主要是海洋捕捞技术的不断提高更新。如渔船普遍装上了鱼群探测仪,灯光引诱,围网作业,渔船的吨位越来越大,动力越来越强,捕捞的范围越来越广,同时渔网越来越大网眼却越来越小……另一方面,渔船的数量也大幅增加,从单船,到对船,再到船队。所有这些可概括为,随着捕捞能力的大幅提升,大黄鱼被捕捞的可能性大大增加,其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压缩。

除了捕捞能力大幅提升外,大黄鱼资源“枯竭”的另一个原因,就是遭到“野蛮”捕捞,也就是所谓的“敲罟”作业法。

史载,这种渔业方式最早起自明嘉靖年间。据传,“敲罟”作业法,出自潮汕地区南澳县、饶平县一带。当地在中元节(农历七月十五)有超度亡灵、僧人放水灯的习俗。为营造氛围,在放水灯时还会配以敲鼓。偶然中发现,每当其时都会有黄鱼浮出水面。于是当地渔民开始试着以敲鼓的方法捕捞大黄鱼,结果证明确实有效,由此发明了“敲罟”作

业法。据业内朋友讲解,该作业法的工作原理是:在船上敲鼓时,水中有很强的声波传递,而声波会对“石首科”鱼类造成冲击。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“敲罟”作业会引起黄鱼的耳石共振,导致其昏迷死亡。黄鱼系石首科鱼类,古籍里称石首鱼。大黄鱼头骨内有鱼耳石,起平衡和听觉作用,所以大黄鱼对声音比较敏感。

对“敲罟”作业法了解颇为深入的何会长认为,该作业法捕捞大黄鱼确实有效,但没传说中的那么玄乎。其实敲鼓声波对黄鱼会造成惊吓作用,既没有什么声波共振致其昏迷,更不会造成黄鱼死亡。敲鼓的基本作用就是驱赶,即把一定范围内的大黄鱼通过声波“驱赶”到围网中。

至于具体如何操作,何会长表示“敲罟”作业法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。他介绍说,该作业法捕捞大黄鱼时要有一组船配合,即一个作业单位,专业术语称为“一艘”。“一艘”之中分别设有“公罟”和“母罟”两艘大的指挥船,四周还有十数条小船拉网配合。由于范围大,相互之间要通过旗语来沟通。在确认该水域有鱼群时,“公罟”船会率先在下游水域下网,随后两边小船连着撒下围网,一直到“艘”内的小船排完,再和待在上游处的“母罟”船相连,形成合围。然后,“公罟”船一边敲鼓一边迎着水流前行(大黄鱼喜欢待在有水流流动的水域),同时指挥两边小船逐渐靠拢,慢慢缩小包围圈……在这个过程中,选择在哪里下网,什么时候敲鼓(包括敲鼓的缓急、重轻、节奏),小船及“母罟”船如何配合,以及“公罟”船向上游推进的时机、小船合围的速度,等等,这些基本都要视具体的实际情况,凭船老丰富的实践经验来把控。

何会长说,“敲罟作业法”最早出现在广东潮汕饶平县的大埕乡,1953年传到福建的东山岛,然后作为一种先进的大黄鱼捕捞方法在全省推广。1956年,福建惠安渔民到浙江平阳石垟乡(今苍南)用此法捕捞大黄鱼获得高产,于是当地渔民纷纷效仿。“敲罟作业法”称得上是一种特大型海洋捕捞方式,一个作业单位,即一“艘”人员约达200

名左右,大小渔船30多艘,渔网长达120米,网捕产量高,效益显著,这些都促使该捕捞方法迅速传播。以温州为例,1957年温州地区敲罟作业就超过了160艘,大黄鱼年产量亦由常年的5000吨,猛增到近10万吨。

由于在收获高产的同时,该作业法对资源伤害的问题也迅速暴露:此法对黄鱼的杀伤力实在太太,鼓声所及,大小黄鱼往往被一网打尽。因此,1958年4月22日,《浙江省海洋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暂行条例(草案)》颁布,明确提出禁止敲罟作业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国民经济陷入暂时困难时期,不少渔民认为“救鱼不如先救人”,于是铤而走险,不惜冒坐牢的风险,重新搞起了敲罟作业。可能非常时期情况特殊吧,有关管理部门也视而不见,从而使敲罟所获的大黄鱼又源源不断“游入”市场,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城乡食品紧缺的局面。直到1963年3月,国务院下达《关于禁止敲罟的命令》后,省、地、县等各级政府都予以了高度重视,对个别屡教不改者采取了法律措施后,敲罟作业才彻底退出渔场。

对于敲罟作业和大黄鱼资源“枯竭”的关联问题,何会长认为敲罟作业对大黄鱼资源确实造成了重大危害,包括沿岸产卵鱼群被大量捕捞,但由于及时叫停,所以就当时实际情况而言,最多只能说是对资源造成了伤害而非致命性的。事实上敲罟被禁后,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1974年,大黄鱼产量还是增加的。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,前述的宁波传统“四大海产品”,除了带鱼外,包括乌贼等都出现了资源“枯竭”现象。因此也说明,即使没有敲罟作业,在当时不加保护的狂捕滥捞以及此后日益严重的水体污染情况下,大黄鱼的“灭绝”可以说是一个必然趋势。

人们之所以对大黄鱼活成“珍稀”水产品耿耿于怀,主要是大黄鱼在海产品历史中曾经有过的重要的江湖地位。这个可以用数字来说明:1954年,舟山渔场的30万担渔获产量中,大黄鱼多达15万担,因此大黄鱼是舟山渔场的绝对优势种群。另一方面,大黄鱼“游走”得太突然,在绝对高产后,差不多渔民

们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,大黄鱼已难觅踪影、捕捞量呈断崖式跌落了。回过头来探究原因时才发现,1974年一次纯粹的偶发事件,让正在走向“灭绝”路上的大黄鱼,受到了一次被“清零”式的疯狂捕捞,给大黄鱼种群造成了重创。

据《宁波水产志》所载,1974年春,宁波全市有150余对机帆船,同全省近2000对机帆船,到东经125度以东的“沙外”“江外”“舟外”渔场(时称“中央渔场”),用对网捕捞越冬大黄鱼,捕捞总量多达8644吨,其间最大网头达百余吨。宁波海洋渔业公司渔轮一网围进的最高纪录达1500吨。该年全市大黄鱼产量高达2.24万吨,比上年提高52%。全省大黄鱼产量为16.81万吨,比上年提高61%。但从此,大黄鱼产量逐年锐减,并从此一蹶不振。大目洋、岱衢洋等传统大黄鱼渔场,再也未出现以前那样的鱼汛。已在汪洋大海中自然繁殖衍生了千百万年的东海野生大黄鱼,不光消失在宁波人的餐桌上,也逐渐在全国销声匿迹了。

说起1974年这段历史往事,何会长仍会有些激动。他说,志上说的只是结果。事件的起因则完全由于一次“意外”。为了赶季节、抓产量,1974年春节尚未过完,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即在大年初五一早,就派出6组钢质大型拖网渔船前往黄海与渤海湾之间的海域捕捞青鱼。没想到船队刚行至舟山嵊泗列岛附近,其中一艘编号为“宁渔413”的渔船就出了机械故障,宁波人称之为“插蜡烛”了。无奈故障船及其附属船只能就近找地方抛锚抢修,整个船队则继续北上。

经过努力,故障得以顺利排除,日期已是初六了。于是“宁渔413”这一组船仍按原定目标,继续一路北上,去追赶大部队。走了一天一夜后,初七零点刚过,负责值班的大副在鱼探仪的显示屏上看到了一块距海面数十米深、他无法判断确认的模糊影像,于是着人紧急叫醒已经睡下的船长贝财章。贝财章当年是渔业公司大名鼎鼎的老船长,多年的海上生涯,让他练就了一双观察鱼探仪的“火眼金睛”。他仔细看了鱼探仪显示屏上影像后,毫不犹豫,果断命令放网,同时全船紧急动员,要求渔船开足马力,向“影像”包抄过去。很快总长约700米的渔网从船尾悉数放出,并与随行的两条灯光船合拢,没几分钟时间就将鱼探仪上的“影像”围困在网圈之中。

